

# 新中国初期防治血吸虫病的举措与启示

朱文萍 丁 洁

我国人民同血吸虫病作斗争有悠久的历史，但受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无法有效制止此病的流行。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仍在我国南方大面积蔓延，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威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提升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大力开展群防群治运动。经过统筹安排、精密部署、精准施策，血吸虫病得到有效防治，取得显著成效。

## 一、新中国成立前血吸虫病的蔓延状况

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或动物所致的一种严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古代书籍中早有相关记载。公元前15—16世纪，《周易》《周礼》中已有“蛊”字出现。许慎《说文解字》云：“蛊者，腹中虫也。”《医经》云：“腹中虫者，谓之腹内中蛊之毒也。”

1905年，湖南省常德县一位常在洞庭湖捕鱼的18岁男性农民，因患痢疾到常德县的一所医院就诊，粪检中发现有一种虫卵，经过查证，得知是日本血吸虫卵。之后，在我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先后发现病例，证明当时所谓“扬子热”“九江热”“洞庭热”等都是血吸虫病。我国对血吸虫病的调查研究，始于1930年陈方之与李赋京等在江苏、浙江及安徽开展的钉螺现场调查，以及浙江和江苏等地方的居民粪检工作。然而，血吸虫病疫情未能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到新中国成立前，血吸虫病蔓延扩散的县（市）已近140个。

一个人感染血吸虫病后，如果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就有可能引起发热或者腹泻，严重者可导致肝硬化，甚至危及生命；即使得到适当治疗，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治愈。晚期病人会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儿童患病会变成侏儒，妇女患病会影响生育。血吸虫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生产生活，许多村庄因此人亡户绝，田园荒芜。据调查，“上海市青浦县任屯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20年间就有500多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其中全家死绝的有97户，死剩1人的有28户，全村连续7—8年听不到婴儿的哭声，

侥幸活下来的461人也都患有血吸虫病”<sup>①</sup>。

## 二、防治血吸虫病的主要举措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大面积流行的血吸虫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紧急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积极推动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

（一）深入调研，将防治工作作为政治任务来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51年，毛泽东派血防人员到浙江余江等地调查摸底，提出初步对策。1953年9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将一份有关南方血吸虫病的汇报材料（由无锡血吸虫病防治所沈瑜撰写）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回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sup>②</sup>

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一方面派出大量人员前往疫区深入调研，一方面抽出时间，于1955年亲自外出走访。经过大规模调查发现，血吸虫病主要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县（市）蔓延，范围很广，受灾面积也即钉螺的分布面积近150亿平方米，病患数量达到1200多万人，有1亿人以上直接受血吸虫病的威胁。疫区人口锐减，生产几近停摆。

毛泽东忧心忡忡地说，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当作一件大事来抓。1956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二）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各级防治领导组织体系

为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毛泽东提出“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sup>③</sup>。也就是说，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

① 王建明：《血吸虫病及其防治》，金盾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页。

③ 华宸编著：《擎天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1949—1976）》，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页。

1955年，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成立，又称九人小组。各省委先后成立五人或七人小组。中央及各省委的领导小组制定相对规律的会议制度，基本上每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共同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各地委成立的五人或七人小组每2个月开一次会，县委成立的五人或七人小组每月开一次会。<sup>①</sup>定期的汇报制度由此建立。

1957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全国从省市到县都建立了相应的各级防治委员会。不仅如此，血吸虫病防治局也正式成立，与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各级卫生部门均成立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或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疫情较重的地区则成立血吸虫病防治所、防治站和防治组。“到1957年4月，已有309个县展开了血防工作，建立了19个专门防治所，236个防治站，1346个防治组。”<sup>②</sup>至此，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血防专业机构和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业务技术不断提高”<sup>③</sup>。

### （三）搞好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

毛泽东一直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血吸虫病防治的斗争中，更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的血防运动。

毛泽东认为，要开展防疫斗争，必须要让人民群众了解有关疫情的科学知识。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制定多项措施，颁发《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等文件。各级党委和血防机构还积极向群众进行最为广泛的科普教育，运用诉病害苦、算得失账、现身说法、实物展览与总结成绩、表扬先进等方法，从思想上发动群众。防治工作开始时，着重宣传血吸虫的生活史、危害性。在灭螺运动中，通过解剖阳性钉螺和实物展览等，着重宣传钉螺与血吸虫病的关系，灭螺与生产相结合的一致性、可能性，提出“哪里积肥，哪里就灭螺”等行动口号。在治疗、粪检中，着重宣传“早治比晚治好，不治疗不但害自己，而且传播虫卵，危害别人，遗害子孙”，并具体计算治疗前后工分增长、收入增加、生活改善的对比账，发动治愈病人以亲身经历讲明道理。在整风运动中，有的地方围绕消灭血吸虫病“好不好、要不要、能不能”进行辩论，使宣传教育工作发挥先锋作用和指导作用，逐步提高群众对血防工作的思想认识，树立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与决心，有力推动了血防工作的开展。

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坚持突击运动战和经常防治战相结合，全面引导群众防治。一方面加强粪便管理、饮水管理和其他防护措施，从源头上阻断传染源；另一方面则在证明钉螺是血吸虫唯一中间宿主的前提下，采取火焚、土埋等办法，消灭钉螺。

在毛泽东指示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螺运动，专门成立基层灭螺队，发动群众积极灭螺，效果显著。1956年，灭螺面积就多达10亿平方米。<sup>④</sup>同时，为切断接触传染源，全国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 （四）采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提高治疗功效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sup>⑤</sup>。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离不开先进的治疗技术，必须中西医结合，同时要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研究更有效的防治药物和办法。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浙江卫生实验院寄生虫学研究所及许多医学院校，把防治血吸虫病作为主要任务，就血吸虫病的流行病学、基础理论及防治方法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

当时有一种常用的西药“酒石酸锑钾”，注射治疗20天左右，10个病人中有六七人能治好。不过，这种药也有缺点，注射的地方有些痛，有的人还出现肚子痛、呕吐、头痛、全身痛、发烧等症状。后来，经过对药物研究改进，病人打针后的反应大大减轻，有的病人只要3—6天就能治好。

“酒石酸锑钾”因其有一定的副作用，不太适用于晚期病人。相较之下，中医的不少方子反而有很大效果。安徽省发现的“乌柏根皮”、浙江省发现的“腹水草”和江苏省发现的“龙虎草”等中药，均能治疗血吸虫病。许多中医方子，如“金黄丸”等，也对血吸虫病有很好的疗效。所以，有些地方

- ① 施亚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血防工作的重视与领导》，《党史文苑》2011年第4期。
- ② 曹普：《论毛泽东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大贡献》，《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 ③ 本书编委会：《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 ④ 肖爱树：《具有中国特色的爱国卫生运动》，《档案春秋》2020年第8期。
- ⑤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61页。

开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病人。先让病人吃中药，使他们的身体好一些，肿大的肚子也小一些。如果中药还不能断根，就再用西药治疗。

在治疗操作上，多种方法相结合，提高医治效率。在管理病人上，依靠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照顾病人；在操作技术上，加快诊治速度，如体检写病历只用2分钟，注射只用20秒，体检只听心脏等；在器械改进上，发明“针头快速减速器”“快速抽药”“梯剂安甌成盒消毒器”等11种医疗器械，使工效提高5—10倍。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1958年，余江县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专门赋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sup>①</sup>将血防运动推向高潮。到1964年，全国血吸虫病流行的县市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2/3，近70%的血吸虫病人得到救治。许多全国闻名的“寡妇村”“罗汉村”，如上海青浦的任屯村、浙江嘉兴的净湘乡、江西丰城的傅家村、湖南临湘的象骨村等，都成了年年田增产、处处人兴旺的好地方。

### 三、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初期我国防治血吸虫病成绩之大、收效之快，令世界各国医学界为之惊异，这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科学决策有着密切关系。党领导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为当前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对我国继续加强卫生防疫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战胜疫情的根本保证，是有效应对一次又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成功经验，更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所在。新中国初期，为了早日消灭血吸虫病，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农业、水利、宣传、卫生等多个部门协同作战。此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制定疫情防控方针政策，“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研究部署工作，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sup>②</sup>。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确保疫情防控有力有序推进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

第二，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与群众参与模式。人

民群众历来是战“疫”的主体，是防控疫情的最强力量，才是真正的英雄。为了防治和消灭血吸虫病，党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了一场漂亮的人民战争。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sup>③</sup>。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农村与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

第三，采取积极正面的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疫情暴发，都会带来一定的焦虑和恐慌。当年一些血吸虫病人就自暴自弃，求助于神灵。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各级党委、政府采取措施，积极组织宣讲和科普活动，通过实物展览、总结经验会等，帮助群众科学理性地对待疾病。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要做好宣传舆论工作，不仅要引导群众自觉提升自我防范能力，还要积极主动宣传党的决策部署，认真讲好防疫抗疫的生动故事，为疫情防控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第四，把疫情防控与群众根本利益相联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疫情不能阻挡生产发展的脚步。在曾经的血吸虫病疫区，主要负责同志把血防工作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无论是制定政策，还是检查工作，都做到两手抓，在稳步推进农业生产的同时，血防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因此，只有保障各个领域的生产生活正常运行，才能让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得到最坚强的支撑，最终夺取抗疫斗争的全面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北京 100081；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 100161）

- ① 毛泽东：《送瘟神二首》，《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
- ②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 ③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